

楊帥：鄉村治理機制創新歸納

簡介：

楊帥，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農村金融與土地問題。

正文：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彙報的題目是鄉村治理機制的創新與歸納。選這個題目的主要原因是自2007年進入人民大學跟隨溫老師學習以來，參與了若干個社科重大、重點及各類項目，項目組成員在溫老師的指導下集體形成了許多鄉村治理機制方面的理論創新。大部分創新性的觀點已經收錄入《三農與三治》這本文集了，大家有興趣可以查閱參考。下面，我就自己的理解，大概從四個方面簡要加以歸納：**一個核心、兩種理性、三大機制、四個支撐。**

（一）一個核心：應對外部風險問題

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就是風險問題，不管是中國的農村，還是外國的農村，不管是歷史上，還是當代，風險問題是一個基本的問題。只不過在傳統的鄉村，更大的風險可能是家庭的生計安全和生存風險；村莊作為家庭的外延，也作為一個整體來應對村莊面臨的各種風險問題。到了近現代以來，造成風險的一個本源性的原因是市場的風險，當然還有社會治理的風險，其他領域的風險等等，但本源性的風險仍然是市場風險。因為市場是資本往鄉村擴張的主要渠道，對鄉村形成擠壓，對生態造成破壞。因此，當代鄉村各種主要風險的本源就是產生於市場風險，這是個核心問題，也是一個普遍性問題。

（二）兩種理性：群體理性VS個體理性

如何應對外部風險呢？東西方在應對時，有兩種不同的理性行為特點，這兩種理性產生於兩種不同的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之中。溫老師提出了以土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主要線索的分析框架。兩種不同的文明最終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下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行為邏輯。

一種是西方主流學科所說的個體理性的邏輯。其特點，簡單來說就是每個個體在應對風險的時候，都想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利潤最大化。其背後隱含的

思路就是成本轉嫁的思路，就是讓自己承擔最小的代價、獲得更大的收益。個人是如此，個人凝結起來的企業是如此，再上升到國家層面也是如此，所以在個體理性下形成的必然是不斷將風險往外轉移、將成本向外轉嫁的邏輯體系。

當然，西方自身的社會科學體系內部，已經對這種個人理性的邏輯進行了充分的批判。主要是因為它不是一種建立在歷史實踐和社會現實基礎上的範式，它是從形式邏輯出發建立的一種範式。

跟西方相對的就是東方社會產生的群體理性，這個東方社會不僅包括中國和東亞，馬克思描述的亞細亞形態裡面的印度村社也是這樣。他們在長期的農耕生產中，要在地理、氣候等各種約束條件下，應對各種風險，需要組織起來進行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積貯防災等，這決定了其必然是一種組織化的生產模式，同時也是一種群體化的社會生活模式，由此就產生了群體化的理性行為特徵。

群體理性的基因是家庭。家庭理性就是家庭作為一個整體應對外部風險。傳統社會裡面家庭最大的風險就是生存風險。其中，足夠的糧食消費是個基本的問題。所以，雖然糧食生產與手工業的市場收益相比有差異，但從事不同生產的家庭成員之間並不會按照各自的勞動貢獻進行分配。因為，家庭考慮的是所有成員的生存。根據勞動的邊際貢獻來做分配是市場的邏輯，而在家庭裡面是平均分配的邏輯。這裡，我們所說的平均是相對的，因為受文化的影響男女會有所差別，但整體上家庭成員之間是一個平均分配的邏輯。這個平均的邏輯就是為了保證家裡面所有的成員都能生存，在這種生存的邏輯下就產生了這樣一種整體化的理性特徵，即家庭理性。

當這種整體性的理性特徵外延到自然邊界確定的村社範圍內的時候，就形成了村社理性。即以村社作為整體去應對各種外部性風險問題，包括各種自然風險、兵匪過境、以及各種災害性風險等等。

（三）三大機制：風險內部化、收益社區化、要素再定價

既然應對風險有兩種不同的行為特徵，那就會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應對風險的機制。西方個體理性下形成的是個人不承擔代價而獲取最大收益的機制，所以就是風險外部轉移的機制。而東方群體理性下派生的是做為整體應對外部風險，**將外部性風險內部化處理的機制**。這是三大機制的第一個。

當然，風險內部化機制發揮作用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之所以能夠凝聚成這樣一個群體、並維持這個群體的存在，進而保證這種群體理性發揮作用，在群體內部就要有一種有別於市場競爭體系下的物競天擇、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分配方式，即社區化的分配

方式，或者把它概括為**收益社會（社區）化**。風險內部化機制是要靠這個機製作為經濟支撐的。但是，由於近現代以來市場和資本的力量不斷往鄉村擠壓和延伸，破壞了鄉村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基礎，並導致鄉村人、財、土地三要素日益流出（或流失），使鄉村沒有了收益的來源。因此，要在當代重建風險內部化機制，首先就要解決收益的問題。

當前，我們看到歷史條件已經發生了新變化，即包括鄉村生態、文化等在內的空間資源的價值凸顯出來，所以就產生了第三個機制，就是**要素再定價的機制**。空間資源再定價，這些年大家一直在討論。其實，在生態要素再定價的同時，原來留守在鄉村、不被工業勞動力市場看好的「殘值勞動力」群體也獲得了再定價的機會。也就是說那些留守的老人、婦女群體，他們作為一種勞動力，作為一種資源，其價格也隨著生態價值的發現而被重新發現，包括他們身上附帶的各種文化，生態化耕作的經驗，傳統的傳承等等，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都變成可以被市場定價的要素。

因此，當代鄉村應對風險，有賴於三個機制發揮作用。包括：風險內部化機制、收益社會（社區）化機制、以及當前條件下的要素再定價機制。三個機制互相協調，互為支撐。而這三個機制性的作用要落地，要靠四個方面的支撐。

（四）四大支撐：成員權、雙層PPP、三級市場、「金山銀山」本位

成員權。第一個最根本的支撐就是成員權，成員權跟集體經濟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我們所說的集體經濟是體現成員權收益的集體經濟，而成員權收益的真正實現也要靠集體經濟產生收益。在中國，成員權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因為在歷史的條件下，產生了村社成員共同生活的狀態。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以及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地方工業化（鄉鎮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成員權也都發揮了重要的功能。在當前，成員權仍然是我們討論農村經濟制度的前提約束，我們的憲法規定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所以這是一個前提性的約束，是其他制度的根本。

雙層PPP設計。成員權的實現，是和集體經濟發展聯繫在一起的。當代集體經濟在長期的去組織化改革過程中，曾趨於弱化。特別是當村內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固化到成員手中，其他的資源性資產大部分也是在分戶使用時，集體經濟就失去了資源性資產這個基礎。隨著2005年國家推進新農村建設，到十九大又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每一年對鄉村都有大量的建設投入，這樣就有大量新的公共資產沈澱在鄉村。這種政府投入形成的公共資產，就是新時代可以被活化的、集體經濟的重要資產來源。在此基礎上，就能

夠形成第二個支撐，即通過雙層的PPP設計，重新建立集體經濟，重新激活農村資源型資產。

第一層PPP是在國家投入與鄉村集體之間形成的。首先，國家的公共性的財政投入是典型的公共投入，所以是有Public（公共）性質的。當國家投入到鄉村，它的所有權可以保留在國家手裡，收益權和使用權可以交給農村集體，而將最後的收益權作股量化到村內成員。這樣，村集體作為一個單位就佔有了國家投入帶來的收益，相對村外而言這種產權是有排他性的，而且在村內也是做股量化到集體成員，由成員個體佔有收益的，所以它相對國家的投入就有Private（私人）的性質。這是第一層的PPP。

第二層PPP是在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外投資主體之間形成的。在形成第一層PPP的過程中，集體以國家的投入產生的集體性收益，吸引村內成員入股配資，調動農民的資源型資產入股或者資金的投入，這樣就使得成員再次回到集體經濟。當回到集體經濟之後，產生的收益在村內又是對村內成員進行社會化分配的。因此，當新型集體經濟重新建立起來之後，集體經濟組織相對於外部的投資主體來說就有公共性：集體作為一個Public和外部投資者的Private之間就形成了第二層的PPP結構。

三級市場。在這兩層PPP的基礎上，就可以進一步地發育三級市場。當然，三級市場的一二級市場和雙層PPP是有重疊的。三級市場近期討論的非常多，在此不再贅述。可以參考已發表的兩篇文章，《鄉村振興背景下生態資源價值實現形式的創新》（《中國軟科學》2018.12）、《空間資源再定價與重構新型集體經濟》（《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0.6）。

「金山銀山」本位。前面所有的設計落實的基礎上，最終要依靠「金山銀山本位」，完成中國貨幣發行生態化轉型。所謂「金山銀山」本位，實際上就是貨幣的發行機制由原來的外儲發行，回歸到或部分回歸到以我們國家主權可控的資源為錨定物發行貨幣。馬克思說，「貨幣天然是金銀」，從邏輯上來看，既然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那麼「金山銀山」也能成為貨幣發行的依據。

那麼，依靠「金山銀山」本位發行貨幣的障礙在哪呢？主要問題是，如果是在分散狀態下，由一個一個的農村成員分散佔有資源，並跟外部主體進行個體化交易，大量分散的交易過程所產生的收益就很難被國家有序地加以利用，將其作為貨幣發行的一個依據。簡言之，就是交易費用問題。所以只有在前面三個支撐真正落到實處，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建立雙層的PPP，進而發育完善三級市場，那麼就可以以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逐級的解決交易費用問題。解決了前提性的問題，「金山銀山」本位就有條件落到

實處。在鄉村資源資本化的過程中吸納國家增發的貨幣，並在三級市場的交易中形成貨幣放大的乘數效應。

在此基礎上，中國就能夠徹底地擺脫依賴於外儲發行所形成的順週期的風險：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外匯同步下降影響國內貨幣發行，對逆週期做多的調節政策形成制約；反之，經濟順週期上行的時候，外匯同步增多，國內又必須要對衝增發過量的貨幣，在傳統產業嚴重過剩的條件下，增發的貨幣會大量流向投機部門，造成經濟的虛擬化。這種順週期的風險在過去的二十年已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所以「金山銀山」本位不僅對鄉村，對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也具有重要意義。